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孟县卷】

总主编：李玉明

主编：李晶明

# 仇犹古国之谜

张建瑞 著

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纷起，在如今孟县这块土地上，曾有一个国家兴起而跻身于诸侯林立的列强之中，它就是仇犹国……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 目 录

- 引子/1
- 第一章 仇犹国的历史存在/2
- 第二章 仇犹国的居地及其疆界/4
- 第三章 白狄东迁与仇犹国的建立/7
- 第四章 仇犹国的都城与称号/10
- 第五章 仇犹国的族属族姓/14
- 第六章 仇犹国的封建君权制度/17
- 第七章 仇犹国的社会经济/19
- 第八章 仇犹国的文化和社会风尚/21
- 第九章 仇犹国与晋国的关系/23
- 第十章 仇犹国灭亡及其启示意义/29

## 引子

2500 年前的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纷起，在如今孟县这块土地上，曾有一个国家兴起而跻身于诸侯林立的列强之中，它就是仇犹国。由于仇犹国为北方戎狄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弹丸小国，地处偏僻，远离中原，并不属于中原华夏文化系统，自然受到正统史学的歧视和冷落，造成史籍对它记载的缺失。唯其如此，仇犹国历史一直云封雾绕，难觅真迹，颇具神秘。对于它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又是何时由谁建立的国家？它的姓氏及世系传承是如何延续？它的国号称谓有什么含义？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呈怎样的构建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为我们透出哪些文明信息？这一系列问题都迷雾重重。对它的研究，也见智见仁，尚存诸多歧义。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对仇犹古城部分遗址的发掘和本世纪初北关东周墓地的发现，出土了许多极具价值的遗物，引起了省内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也激励了我们这些仇犹研究爱好者的兴趣。经过大家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和不懈探索，笼罩着仇犹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正在变得清晰，斑驳迷离的真相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我的这篇《仇犹古国之谜》的文章，就是多年来潜心研究，对仇犹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系统阐述的初步尝试。

## 第一章 仇犹国的历史存在

仇犹国在我国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历代一些史籍对此也曾有所记载。《吕氏春秋·权勋》载：

中山之国有公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公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详。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公繇亡。

《韩非子·说林下》也载：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悦，除道将纳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纳也。”仇由之君不听，遂纳之。赤章蔓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

《韩非子·喻老》又载：

智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

还有《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

游腾为周说楚王曰：“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战国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也载：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公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曰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公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旦之亡国，



而忧大王。”楚王乃悦。

《淮南子·精神训》记载：

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

另外，诸如《正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绎史》等著作也都略载其事，不再一一列举。所有史籍记载中，虽然所称的公繇、仇由、仇犹名称书写不一，但都是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国家。它们虽然记载的都是仇犹灭亡的过程，但仇犹如果不存在，那来它的灭亡？仇犹灭亡的记载正好证明了它存在的事实。同时，在这些史籍中所说的智伯，即晋大夫智瑶。据《左传》，智瑶又称荀瑶，为晋出公（前 474—前 459）和晋哀公（前 456—前 438）初年时的晋国正卿。他所攻伐的仇犹国，说明至少在他为晋国正卿时的（前 474—前 456）春秋晚期，就已经作为一个诸侯国家而存在着了。

## 第二章 仇犹国的居地及其疆界

仇犹国存在的史实既然确凿无疑，那么它的国家居地究竟在什么地方？据《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仇犹”的说法，仇犹应从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在春秋战国时位于今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正定一带。仇犹既为其属国，应该是位于靠近它的地方；又据东汉高诱在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仇犹的地理位置作注时，说仇犹为“近晋之狄国”，由此可见仇犹与晋相邻。而与仇犹相邻的晋，是指晋国的东北部地区，这里曾是晋宗室祁盈的封地。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 514）载：“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七县中的马首和孟，就临近仇犹西部边界。这就说明，仇犹的居地就在既靠近中山、又临近晋国的太行山西麓，如今的孟县境内。至于鲍彪在为《战国策》作注时，认为仇犹“属临淮”，显然属于误解。临淮即今江苏省泗洪县，春秋时为吴国之地，距中山和晋国甚远，临淮彼仇犹非春秋此仇犹。

我们还可以从历代地域图志有关记述中，进一步证实仇犹在孟县立国存在的事实。据唐贞观十六年（642）李泰编撰的《括地志》载：“并州孟县外城名原仇山，亦名仇犹，戎狄之国也。”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载：“孟县……县城，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犹城。”“智伯欲伐仇犹国……盖其地也。”这是原仇地名几经变化，于隋大业二年始定名为孟县后，在唐代的地图志中明确地注明孟县为仇犹故地的记载。到了宋代雍熙年间（984—987）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也载：“仇犹城，（孟）县之外城也，俗名原仇城。”“智伯欲伐仇犹国……盖其地也。”至于明清时期的记述更为多见。明洪武十三年（1380）修的《太原志》载：“孟县，本春秋时仇犹之国。”又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记载：“孟县，在府（太原）城东北 240 里，本春秋时仇犹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修《太原府志》也载：“孟县，春秋时为仇犹国。”明末《方以智全书》载：“春秋仇犹国，今之太原府孟县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輿纪要》载：“孟县，春秋时仇犹国。”清雍正（1723—1735）年间汪越撰《二十五史补编·孟县》及《山西通志》都载：“孟县，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犹城，智伯所灭仇犹即此也。”“仇犹，今孟县。”乾隆八年（1743）成书

的《大清一统志》和嘉庆时（1803）的《乾隆府州县图志》也都有相同的记载。此外，孟县历代所修的县志，如康熙十七至四十一年（1678—1702）的《新修孟县志》、乾隆三十三至四十九年（1768—1784）的《重修孟县志》、光绪四至七年（1878—1881）的《孟县志》等，都有“仇犹国，即今孟县是也”的记载。从以上这么多历朝历代的图志记载表明，孟县为仇犹国所在地是毋庸置疑的。

在仇犹国存在前的孟县之地，已经有过人类在此生息繁衍的史前文明历史。1984年，在孟县庄子村黑砚水河1号洞穴遗址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化石和骨片上有人工打制和使用的痕迹，遗址被认定属于旧石器晚期。又据1924年以来先后在孟县仙人村、土塔村、东园村和路家村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刀、石锤等，也都足以证明早在四、五千年至一万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开始了人类生存的文明史。夏、商、西周三代，据《孟县志》载，今孟县属于九州之并州。在1987年刘有祯先生对仇犹古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墓葬及鬲、盆、尊、簋、罐、鼎足等陶器以及石斧、石刀、蚌镰等石器，说明早在殷商时期原仇犹城之地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时还从一处灰坑中，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夹砂红陶鬲、灰陶盆、罐、夹砂棕色陶瓮和豆等，进一步证实了西周时期仍然有住民在此生活。以上考古发现清楚地看到了在孟县这块地方，从新旧石器时期直到殷商周三代，人们生存发展的历史。它的归属也有脉络可寻。到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天下大乱，诸侯林立，在仇犹立国前，这块地方是谁的属地，又归哪个诸侯国统治管辖？有的研究者说是晋国封的“孟”地，归晋管辖。我以为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据《山西通志》等史书载，公元前541年晋狄大卤之战前，晋国的势力范围还没有越过霍山。仇犹之地远在霍山之东北部，也就谈不到晋国的势力能到达这里了。只是在公元前541年，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而迫使其北迁后，晋国的势力才到达了今晋中、太原一带。而此时仇犹早已经存在了。至于晋封“孟”地之说，在清乾隆《新修孟县志》中，有一段比较全面的辨析：“春秋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卫太子蒯聩献孟于齐，卫之孟也；而晋则有二孟，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郛、逆时、阴人、孟、壶口，此孟当在邢、洛之间；昭公二十八年，孟丙为孟大夫，此则今孟县西境也。”这里所说孟丙之孟，才是晋

所封的“孟”。就是公元前 514 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其中的孟为孟丙的封邑，也就是今孟县西境，“其东北境乃仇犹国”（清·《新修孟县志》）这就明白无误地分清了春秋时“孟”与仇犹的界限，清楚地说明它们不是一地，而是共存非属的关系。

由此，我们便可以大致界定仇犹国的西部疆界。在公元前 541 年晋狄大鹵之战前，仇犹的西部与群狄和无终国为邻，群狄和无终被驱北迁后，又与晋国接壤。到公元前 514 年晋分祁氏之田后，则与晋的孟、马首相邻。也就是说仇犹国的西部边界，没有越过管头山和方山。它的东部边界则直至太行山西麓，东西边界距离百里许。北部边界应是在牛道岭下的滹沱河沿岸。在滹沱河边的御枣口至今仍有纪念仇犹天子的仇犹观，据说为唐代始建，这也可以说明仇犹人于此地曾有过活动。仇犹的南界应为今县城三十里外的石艾山和双鹤山，南北界距离有百余里。从四周的疆界看出，仇犹不过是个百里小国。

但就是这个不过百里小国的开疆立国，却开创了孟县历史的新纪元。二千多年来，孟县在仇犹国基础上变迁发展，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历史。公元前 547 年左右仇犹国灭亡后，战国时期，仇犹属赵国，赵在仇犹城的基础上建原仇城。秦汉实行郡县制，仇犹汉代为上艾县，至后魏改为石艾县，直至隋开皇十六年（569）分置的原仇县，显然是采用了战国原仇城以为名，大业初乃复名为孟县。为何所有志书在此处记载时都称“复名”为孟县？据清乾隆《新修孟县志》载：“盖秦以前（孟）与仇犹之境分，汉以后孟与仇犹之境合。”可见在汉代，春秋孟丙之孟与仇犹之地曾经同为一个县，而隋置孟县，是沿用了汉孟县之名，今孟县的名称是由此而来的，并非因地形似孟而得名。在隋后 1500 余年历史长河中，尽管孟县所归属的州府多有变化，但其孟县县称始终如一，历史证明了仇犹故土的不朽生命力。

### 第三章 白狄东迁与仇犹国的建立

仇犹为戎狄国家，较早源于东汉的高诱，他在《战国策》注释中说：“仇由，狄国也。”与高诱同为东汉的许慎在《裴骃集解》中也说：“仇犹，夷狄之国。”不少史家也都认为，仇犹是北狄民族中白狄别支所建立的狄人国家。我认为这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说法。因此，仇犹国的建立应从白狄的东迁说起。

北狄族，在商周时期称为鬼方。先秦文献及《史记》、《汉书》中称作狄或北狄，（或写作翟和北翟）。从黄帝起直到商周之际，北狄的居住地始终在蒙古大沙漠以南的渭北、河套地区，是商周王朝统治下的民族之一。商朝到了商王武丁时期，对鬼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西周建立后，对鬼方的征讨，比商代规模更大。在商周王朝的打击下，为避免残酷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一部分鬼方人开始了民族的东迁行动，进入了陕山高原和太行山一带。据《国语·郑语》载：“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这段话是西周幽王八年（前 774）周太史伯说的。他所说的这 30 多个封国和少数民族部落集团中，除了 20 多个姬姓之国和异姓诸侯外，其余便是“蛮、夷、戎、狄”，而其中的“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隗”等则为狄族部落。这说明在西周末年，成周洛阳的西部和北部已经有了狄人。到了春秋时期，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二》记载，在晋国周围“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居深山，戎狄与之为邻。”说明了这个时期狄人已到了晋北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显然是鬼方人东迁到了这里。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北狄族（鬼方人），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记载，已经分为了赤狄、白狄和长狄，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其中赤狄最强，影响最大，它由六个部落集团分别组建起了皋落、潞、留吁、甲氏、铎辰和廛咎如等国家。春秋初年多集中于当时晋国的南北东三面，即今山西南部 and 东南部；春秋中叶后，又迁到了晋国以东，即今山西长治地区和河北邯郸地区；长狄则分布在宋、鲁、齐、卫之间，即今河南东部与山东交界的地方。而白狄的分布地，

据《国语·齐语》载，齐桓公“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此处的西河，史家认为即圉水，圉水即今陕西北部的无定河，说明齐桓公所征的白狄，在陕北无定河一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前 636）曾记载，晋文公在追述他在狄地逃难生活时说：“余从狄君以田渭滨。”从晋文公曾与白狄之君在渭水打猎，可知渭水也为白狄居地；《左传·成公十三年》（前 578）载，晋厉公致秦桓公《绝秦书》说：“白狄与君同州。”此处之州是指渭水以北的古雍州地，此时的白狄已与秦共同居住在雍州地区。以上史料说明，春秋初白狄的分布地，从今陕西北部无定河向南直达渭水流域。此外，在《四书释地》中说：“山西交城县为狄地，舅犯（狐偃）实生其地。”说明晋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县；《左传·成公十二年》载：“秋，晋人败狄于交刚。”此狄为白狄，交刚即今山西隰县。这些记载说明，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的西北部亦有白狄的分布。

东迁后的北狄族分布于如此广大的区域，有的如赤狄、长狄已到了中原地区，存在于一些华夏大国和诸侯国之间。他们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不断同华夏诸国争夺土地和势力范围，甚至企图与齐、晋争霸；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还广泛参与了华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甚至为控制东周王室而斗争。所有这些不但对华夏诸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给大国之间争霸造成了障碍。因此，一些华夏国家，尤其是齐鲁与晋国，把狄人的威胁看成是心腹之患，从而不断对北狄诸部采取军事行动。公元前 616 年至公元前 607 年，长狄在齐鲁等国的攻击下灭亡；公元前 594 年至公元前 588 年，赤狄所属的六个部落国家也被晋国全部攻灭。自此，北狄的三大部族仅剩下了白狄。

白狄之所以没被灭亡，反而在长狄和赤狄相继灭亡后继续存在，一是因为它地处西北，远离大国角逐争霸的中原地区，占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它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利用当时秦晋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时而投靠晋国反对秦国，时而又依恃秦国反对晋国，在大国之间回旋，以求得生存空间。白狄就是这样在大国隙缝中求生，实际上充当着秦晋两国的附庸，一直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晋悼公的和戎政策的实施，他们才被迫开始了又一次的向东迁徙。

白狄之所以从他们长期居住的晋西北、陕北向太行山东麓大规模迁徙，主要原因是晋悼公推行的和戎政策所致。公元前 569 年晋悼公听从魏绛的建议，对居住在晋国边界内外的戎狄民族实行和戎政策。其政策的重点就是停止对戎狄的武

装侵害和掠夺，利用“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弱点，代之以和平的“以货易土”即用金钱、货物交换土地的方法，兼并戎狄的土地。和戎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白狄的居地被晋国以欺骗的手段买去，从而和平地将白狄驱赶，使之被迫迁徙。首先东迁的是晋西北部交城、石楼、蒲县以北地区的白狄，这部分白狄于公元前 579 年曾进攻过晋国的交刚，但是自和戎政策推行后，这部分白狄从上述地区消失了，它们显然是东迁了。接着，居住在陕北雍州的白狄，自晋悼公和戎政策后，所有先秦文献再也没有他们在雍州活动的记载，显然他们也受和戎政策的影响，向东迁徙了。白狄东迁的路线虽然史籍缺载，但据何艳杰等先生在《鲜虞中山国史》一书中描述，因白狄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他们从今陕北、山西西北到了晋东北后，沿着蜿蜒东南流的滹沱河东进，沿途经繁峙、代县、原平、定襄、盂县，最后到了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大平原。

白狄的东迁，从公元前 569 年晋悼公和戎政策起，至公元前 555 年，《左传》所载的“白狄始来”，即白狄初次到鲁境为止，经过十几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自此之后，“白狄所属诸氏部落的名字及分布地，开始频繁地显现于史乘。其分布及活动中心集中于今山西省东北部的盂县以东至河北石家庄市周围地区。”（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并且建立起了由鲜虞、肥、鼓和仇犹四个氏族部落组成的国家。其中的仇犹就是东迁途中有白狄别支进入今盂县而建立的。因此，仇犹立国时间应在白狄东迁结束，进入太行山区的公元前 555 年左右。



## 第四章 仇犹国的都城与称号

白狄于公元前 555 年左右进入今孟县境内立国后，直到公元前 500 年左右，也就是在仇犹国经历了 50 多年后的中期才出现了城市，这便是它的都城仇犹城。在今县城北村、水泉村之间，称为古城坪地方，便是仇犹古城遗址所在地。1987 年，刘有祯先生曾对残留几处古城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灰坑和墓葬，从这些遗迹和城内墙的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的鬲、盆、罐、豆、碗、孟等日用陶器和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用陶，尤其在城内墙出土的春秋晚期黑皮红陶大板瓦，如涂过黑漆一样光亮，无疑是用在宫殿上的建筑物。据刘先生对这些遗迹、遗物的分析推断，仇犹古城筑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春秋晚期（《考古》1991 年刘有祯：“山西孟县东周仇犹遗址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这就同白狄东迁进入今孟县境内建立仇犹的时间（前 555 年左右）相差几十年。这说明白狄东迁远道而来，进入一个陌生地方后，并没有立即兴建都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过着不定居的游牧式生活。在此期间，他们一方面熟悉适应新的环境，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降服这里聚居的民族部落和原住民，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前面已经说过，白狄到来之前，这里既不是晋国的属地，更不可能是其他诸侯国的属地，而应该还是一片无人管辖的空地。当然空地并不是说无人居住，就在县城东 15 公里外至今留有春秋早期皋牢城遗址，据说为赤狄所建。这些赤狄人可能是晋国打败东山皋落氏后，北逃到这里建城聚居的；其他地方也不能排除存在有群狄部落或华夏族聚居的可能。白狄人收服这些部落和原著民，拓展自己的统治疆域，可想而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他们这样经过几十年的生存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统治区域也由开始的滹沱河流域，沿着龙华河向南延伸到了香河、秀水河流域，有了建立都城的必要和条件，于是开始了选址建都，而此时已经到了春秋晚期。虽然一些史籍对古城的始建年代缺载，但对古城的建制和规模却作出过记载，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原志》和明《永乐大典》都载：“仇犹城，周九里六十步。”“内城周长三里五十步。”如果按古制：“百里之国，九里之城”的标准，说明仇犹是个具有百里之国的国家；如按《周书·作雒篇》谓天子之城九里的说法，说明仇

犹城是以天子之城修建的。当然这些标准都是周礼制度，是针对周天子及其所属诸侯国规定的，而仇犹这样做，显然僭越了古制，违背了周礼，但也说明仇犹是个不受周礼制度约束的戎狄国家。修筑这样规模巨大的都城，不仅反映了仇犹国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后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反映了仇犹国具有的先进设计理念和高超的建筑技术。从选址上看，古城址以仇犹山为案山，靠山近水，向阳避风，四周重冈迭阜，拥护而围绕，为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是中国风水原理运用城市规划的极好体现。从规划和建筑上看，古城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既充分考虑了水资源的利用因素，还兼顾了防卫的需要。古城南临秀水河，北有香河，建在一个两河交汇处的开阔坪地上。两条河水既可解决生活用水，也可作为护城河，形成自然的安全防卫屏障。从建筑布局看，古城分内城和外城，由两个不规则的长方形组成。内城建有宫殿，为仇犹君臣居住办公的地方；外城则为民众聚居之地。筑城的方法是先挖好地基，再层层夯筑后建墙，显得特别坚实牢固。城墙外筑有壕沟，距城 3—5 米，宽 7—9 米，由此可见筑城时把防卫作为重要因素。使城置于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可以“就地之势”（《将苑》语），使山水无形构成了一道城外防线，从而收到易守难攻的效果。这样的规划设计理念，对于一个在列强隙缝中生存而随时都有被侵害的小国来说，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随着都城的建立，仇犹开始有了国家称号。仇犹的称号是都城出现后的春秋晚期才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吕氏春秋》中称仇犹为中山属国而不称鲜虞属国，说明仇犹是在鲜虞更名中山后才有这一称号的。根据研究中山国史的专家称，公元前 555 年白狄东迁来到太行山东麓，先是在河北正定一带的古鲜虞地立国，因而称为鲜虞，都于新市。之后由于连年战争，鲜虞部落人口减少，国家离散，鲜虞人离开新市，来到中人城，重新建立都城，因而更名鲜虞为中山国。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 506 年，而这一时间也正好是仇犹筑城定都的年代。所以仇犹称号是在它的都城建立后才有的，这时候距离仇犹立国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了。至于之前用过什么称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仇犹的称号，史籍记载较早见于《吕氏春秋·权勋》和《韩非子·说林》。

《吕氏春秋》作“公繇”或作“仇酋”；《韩非子》作“仇由”。公与仇、繇与由为同音通假字。《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作者同是战国末期人，《吕氏春秋》的成书稍早于《韩非子》，《韩非子》中的“仇由”是否由《吕氏春秋》中的“公

繇”音转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仇犹称号的书写开始就不一致，而后的史籍记载也是如此。《淮南子》作“仇由”，《史记》作“仇犹”，《战国策》作“仇由”。后来的学者在为这些史籍作注或是引用时，高诱引《战国策》作“仇首”，《说文繁传》引《吕氏春秋》作“仇由”，《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作“仇繇”，还有一些史书中作“夙繇”、“仇吾”、“泉仇”“口九由”等。无论书写形式怎样变化，除少数属于字体误讹外（如夙与忬形近，易伪），大多为通假互异，读音基本相同。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互易字体，可能是由于音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首届孟县仇犹古国及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也持此种看法。河北社科院魏建震教授认为：“仇犹作为国名译音词，是一个叠韵连绵词，它的名称应该是一个音译名。”上海社科院杨善群教授也认为：“仇犹没有固定的写法，多为同音字，约有十种之多。”根据“多种写法的情况来看，仇犹国也可能自称 qiuyou，于是各种史籍就根据其发音记载其国名，出现了许多同音字的写法。”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书写称呼中，并没有那个是大家唯一公认的，只是后来使用《史记》中的“仇犹”较为多见。

对于仇犹称号的来源，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个别文字的考释，认为仇犹为一蔑称，是晋国或是华夏族强加给它的诬蔑性、歧视性的称呼。我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对史籍中这么多仇犹书写名称的考释，不应通过其中一两个字的推敲引申就轻易断定其褒贬含义。仇犹的称号，不是外来强加的，而应是源于一个地理概念，它同仇犹山有关。据唐《括地志》载：“并州孟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说明原仇与仇犹为同一城名；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山西通志》、《太原志》、《孟县志》等记载：“本县（孟县）北，有仇犹山”，“亦名原仇山”，由此说明仇犹山与原仇山亦是同一山名。对于山名与城名的关系，是山名在先，城名随之，还是城名先有，山名随后？据《元和郡县志》说，仇犹或是原仇是“取此山为名”。可见山名古已有之，城名或国名由山名而来。这种以地名为国名的事例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和仇犹同属白狄国家的鲜虞中山、肥、鼓等国的称号同样都是由地名而来。“鲜虞之得名，即来源于古鲜虞水，所谓国地而氏者也（何艳杰等《鲜虞中山国史》）；中山的得名，如西晋张曜在《中山记》所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人城是中山国初期的都城，中山国名由中人城而来；而“鼓之得名，盖即本于鼓聚。”吕苏生·《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鼓聚位于河北

晋县西北一带，为鼓氏都城；肥国之名源于肥垒城，据《杜氏集解》说：钜鹿下曲阳西南有肥垒城。肥垒即今河北藁城西南之地。这些事例也从旁证实了仇犹因地而名的事实。

## 第五章 仇犹国的族属族姓

1.仇犹国的族属。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从仇犹同鲜虞中山的关系说起。据《吕氏春秋·权勋》篇载：“中山之国有公繇（仇犹）者。”可知仇犹从属于中山国。又“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东迁后的白狄部落集团，主要有鲜虞氏、肥氏、鼓氏、仇由氏等四个氏族部落组成。”（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由此说明，仇犹同鲜虞中山，不仅是从属关系，还同属一个白狄民族组成的部落国家。因此，仇犹同鲜虞中山的族属一样，应同属于白狄民族。

仇犹族属为白狄，还可以从孟县近几年考古发现的遗物中找到依据。2003年，由省考古研究所、阳泉文管会和孟县文管所对县城北关 45 座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据吉琨璋、韩利忠、赵培青“孟县东周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中说，墓地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到中期，墓地及其随葬品整体看属于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但从一些墓地葬制、葬俗及葬品中看到又带有地域特色，有些就是仇犹国的遗存，显示了仇犹遗民的文化面貌。如果我们拿这些墓地中出土的非中原文化系统而又属于仇犹地域特色的遗物，同鲜虞中山考古中发现的遗物相比较，就能发现它们的同质性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葬制看有“石椁墓的存在”（《研究》）。在县城北关东周墓地中有标号 M29 的墓葬为石椁墓，椁是由十多块不太规则的石板砌成。类似的石椁墓在鲜虞中山故地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如河北唐县钓鱼台 1996 年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石椁墓；河北平山县三汲乡访驾村 1970 年发现的用一块大红石板砌成的石椁墓；1971 年河北满城发现的石椁墓，也由不规则的大石块砌成；还有 1984 年河北灵寿岔头村发现的石椁墓等。以上列举的这些地方显然都属于鲜虞中山的故地。另外，在白狄曾活动过的滹沱河流域和河北、陕西北部地区，如山西原平发掘的 18 座石椁墓，山西定襄霍村 1994 年发现的 4 座石椁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有石椁由不规则自然石垒砌而成；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玉皇庙墓地、葫芦沟墓地也存在有石椁墓；在陕西清涧李家崖、神木县、长武县也都发现类似石椁墓葬。（见何艳杰等《鲜虞中山国史》）这么多石椁墓在白狄活动区发

现，说明石椁墓为白狄族特有的葬俗。石椁墓的葬俗，反映出白狄长期生活于山地丘陵地区，有取石方便的环境，因而很自然地把石材用于墓葬，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墓葬习俗。

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研究》）县城北关东周墓地发掘的随葬品中不见青铜器礼器，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在 8 座墓中共出土青铜剑 8 把、戈 4 件，还有箭镞等。这种葬俗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以鼎、鬲、豆、壶等青铜器礼器为基本形式的葬俗，是北方民族尚武精神的体现。据何艳杰等先生《鲜虞中山国史》一书中载，在河北李家庄、新乐中同村、唐县北城子等鲜虞中山故地都出土过数量不等的青铜剑。另外在白狄活动的其他区域，如山西原平刘庄、浑源李峪、北京延庆军都山、河北怀来甘子堡等地也有青铜刀剑的出土。有的学者考证，在东起辽东和冀北，西迄甘肃和宁夏东北部这个半圆形地带，有大量青铜短剑出土，而这一带正是北狄（包括白狄）的活动地带。由此可见，使用青铜短剑为白狄的生活习俗，而把这种习俗带入墓葬便形成了特有的葬俗。

三是出土的陶礼器上“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鬲的肩上有附加堆纹”，还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双耳罐《研究》。以兽类作纹饰图案，为狄民族特有风格，而络绳纹、堆纹也是北方民族纹饰的一个特征。这些纹饰应是白狄游牧民族用绳子捆绑物品方便携带的反映，双耳罐的双耳是为提链的使用，也表现出了游牧生活的遗留。类似的纹饰，也见于鲜虞中山故地出土的器物上。河北行唐李家庄、平山访驾庄、平山穆家庄等都有绳络纹壶的出土；此外山西浑源李峪、原平练家岗等也出土了绳络纹饰的提链壶。相同的纹饰和风格，反映出了仇犹同这些地方的白狄人同属于一个民族。

除此之外，1996 年在县城一处建筑工地上还出土了约千余枚尖首刀币，币面刻有疑似仇犹字样的标志，说明刀币为仇犹制造和使用。据黄锡全先生“先秦货币通论”中说，尖首刀币流通于白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刀币构造带有白狄文化特色，所以被定为狄刀。这种刀币，在太行山以东，河北的灵寿、平山、藁城、石家庄、保定、易县和北京延庆等地都有集中的大量出土；山西潞沱河源头一带的代县、定襄也都出土了尖首刀币。而这些地区同盂县一样都属于白狄活动区域。

2.仇犹国的族姓。据《世本》载：“鲜虞，姬姓，白狄也。”杜预《春秋释例》也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史记·赵世家·索隐》亦云：“中山，古鲜虞